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

学习参考资料

第 7 期

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宣传联络处

一九八〇年六月

关于《党的基本知识》编写过程的讲话

中宣部、中组部编写的《党的基本知识》出版了，大家都在组织学习。我参加这次编写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但是，机会虽好，自己没有学习好，而且对我来讲，参加编写工作只是一小部分，其它章节也很难讲，自己水平低，党的实际工作的经验很缺少。书本知识是不完全的知识，这几年都有明显的感觉，特别是教学、宣传工作变化很多，好多事情难以对付，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四人帮”粉碎以后，这样情况也难以避免。这几年还是恢复时期，拨乱反正阶段。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要求有一个确实比较相对稳定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遵循，可以坚持，也可以供大家有一个依据。党的基本知识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所以党的基本知识无非是反映党的建设上的起码知识，带普遍意义的一些知识。而长期以来给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从全党的情况来看需要恢复，也需要坚持。我想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编写这个小册子，恐怕也是从这点出发的。中宣部主要负责编这个小册子，中宣部、中纪委负责《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和修订。

第一部分，编写这本小册子的过程和指导思想。

这本小册子，从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开始筹备编写。当时，中央酝酿了开全国宣传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普遍要求编写一本党员教材，供全党使用。因此，会议筹备组简报组写了简报，主持会议的张平化同志很支持，送给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看了，六月三日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人手少，可以向各地借”。这两位部长都点头以后，成立了编写组。编写组由中宣部牵头，中组部、中央党校和解放军政治学院，还有出版社的同志参加。我们地方上去了两个同志，上海叫我去，广州还有一个同志，一共十个人。主编是中宣部一个局长。我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底到北京去的。原先，中宣部、中组



部要求，希望我们快一点搞出来，最迟在半年里写出来，一九七八年年底发下来使用，结果拖了一年半，去年底才搞出来，这里有许多情况。一年半时间，大体上说，前半年编写组的同志集中在一起，连续写了三次稿子，同志们知道，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这段时间，国家形势变化相当大，社会上正在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以，在写的过程中，不断觉得思想跟不上形势，刚写好一稿与当时的形势又脱了一大段。写了三稿之后，中央正好开三中全会，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精神，接下去又大开理论务虚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已过了半年，决定外单位去的同志暂时先回去，留下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在原来稿子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精神进行修改。这样我就回来了。去年七月份，中宣部搞出征求意见稿，市委宣传部也翻印了，也是这么十课。去年十月份，胡耀邦同志抓了这工作，提出要根据叶帅报告精神，快点搞出来供党内使用。十月份我又去了，参加定稿工作，共二十天左右，最后定了稿，送出版社。在编写过程中，中传部、中组部的同志给我们创造了不少条件，开了许多座谈会，也给我们及时传达了上面精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和胡乔木同志，专门给编写组，对这本书的编写分别进行了一次座谈，明确了不少问题，给我们壮了胆。由于中央同志直接指点方向，胆子就大了。

为什么要编写这本小册子，刚才说了各方面有强烈要求，很迫切，十一大召开以后，很快收到一千多封来信，纷纷要求把这本书编印出来，供大家上党课。很多问题，需要拨乱反正。为什么中央有关部门要编写这本书，自己体会要从这样三点去考虑。

第一点，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样的转变时期，转折关头，我们党向党的建设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就是说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全党同志怎样适应新时期、新任务，有一个加强党内教育问题。中组部同志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回顾解放以后，由中央方面编写的有三本书，连这本共三本。第一本是一九五一年，当时叫《共产党员读本》，共八课，围绕当时党员八条标准写的，那时针对什么写的？在什么样形势下写的？谁都知道，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那本书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解决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转变问题。第二本是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编写的，书名叫《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共十课。那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党内部分同志，出现了一些动摇、悲观、消极情绪，另外，加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刮共产风，也使我们党内出现了一些瞎指挥、浮夸风，使党的传统受到损害。所以，在那时期，也很需要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克服困难。这样来增强大家的信心，来战胜困难。中宣部同志讲，前面两本书，在党建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今天编的是第三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讲，处在大的转折时期，在林彪、“四人帮”这样一个大的动乱，大的反革命破坏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问题，不仅有一个对党员教育的问题，而且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也就是说有一个怎样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建设党的问题。比如说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们国家不存在了，那么党的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纲领怎么反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四化”新长征过程中的要求，对党员应该提什么样的要求，对党的作风，党规党法，又应该有那些新的要求，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回答的。尤其需要中央来回答。但是，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问题成堆，困

难成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主要领导集中精力抓主要问题，一下子也不可能用很大的精力来专门考虑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一。其次，在党的建设上有很多问题，本身有一个认识过程，一个变化过程，过去许多问题认为是对的，后来形势发展，社会生活变化，认为有问题，甚至是错的，这些问题作为党的基本建设，不能不反映，究竟怎样反映？我们别的不谈，就说“十一大”，“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政治报告。“十一大”是一九七七年召开的，但是到一九七八年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不适用了。所以，回过头来看，变化本身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因为我们是处在转折时期，恢复时期，国民经济在恢复调整，其它包括政治生活，党的生活，过去搞乱的东西，也要恢复、发展，“十一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巨大功绩的。例如深揭“四人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十一大”召开的时候，有“十一大”召开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不能离开这些环境去看问题、去要求。“十一大”通过的文件，带有某种旧的、某些不够确切的烙印，例如走资派问题，那时作为中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当作“十一大”路线的主要内容等等。那时一定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甚至怕丢了这个纲，我们只能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十一大”，尤其三中全会的召开，这里就有一个按什么样的精神，更好地反映党的基本知识，作为党的基本知识究竟哪几条站得住，哪几条原先可能是对的，现在看不那么适用了，还有哪几条原先认为是基本原理，事实上不是基本原理，是错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很好地学习研究，这种情况不能不反映到本子上来，所以，一下子搞不出来，原来讲半年，半年搞不出来，拖了一年半，而且一改再改，直到今天正式出版了，还是试用本。试用的意义包括还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现在五中全会已开了，“十二大”也要开了，“十二大”有个任务，就是要修改党章。“十一大”党章里面就有很多不适用的地方要进一步修改。所以，这个本身反映了我们国家三年多来的变化。关于这个变化，邓小平同志在最近的报告中讲的，是好的变化，是合乎规律的变化。今天能够拿出来，无非中央觉得有这个必要，供党内使用，特别是让广大的基层同志有所遵循，有所根据，因为我们党有三千八百万党员，那么多基层干部中的确很辛苦，他们不可能经常专门去研究这方面的原理，出于这个考虑，所以我们赶快编，编出来快点发下来。现在看来还有许多粗糙的地方。

第二点，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破坏实在太大了，所以很多同志讲，我们党受了重伤，重伤不但是外伤，而且有严重的内伤。外伤是看得见的，比如我们损失了那么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内伤呢？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严重，我们党的思想给搞乱了，党的作风、党规、党法给破坏了。乔木同志有一次在内部讲话中讲到这一点，我们看了之后觉得蛮有启发。他说：林彪、“四人帮”十年的破坏不但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而且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也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民主和党的统一也达到了崩溃边缘。他接连讲了三个崩溃边缘。但我们公开不这么宣传。回味一下他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确也达到了很危险的地步，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许多极左口号，极左东西，充斥着我们党的工作，在党的建设上，也充满着这些东西，极左的东西。比如同志们都知道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群众运动天然合

理”等等，还有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三党六论”等等。粉碎“四人帮”以后，要加强党的建设，就不能不进行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澄清被他们搞乱的思想是非。

第三点，从党内状况来看，也有一个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需要。我们党现在有三千八百万党员。中组部同志和我们座谈时讲：三千多万党员中有一半是文革中入党的，上海的数字可能低一点，占百分之四十三。全国是百分之五十一多一点。这些同志就其大部分来说，本质还是好的。当然不排斥文革期间“双突”的“四人帮”爪牙，他们也混进来了，但这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来说，本质还是好的。但他们没有系统地受过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或者说他们所接受的是一些错误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的观念。对这部分同志来说，当然有一个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问题。说到这里，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四人帮”垮台前，一九七六年，我们学校搞了一个活动，叫做读志愿书，不知道其他单位怎么样，目的是通过读志愿书活动找民主派，还有在学校里找白专道路的典型，志愿书上写着：向科学进军。现在回过头来想一下倒蛮有意思。因为从志愿书上的确可以看到不同时期入党的，对于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土改时入党的都是讲打倒封建地主。我们学校里一九五六年前后入党的同志，志愿书上普遍都有学科学，向科学进军这些口号。四清时入党的，就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同志，志愿书上是一片空话，充满了现代迷信的东西，简直没有实在的东西，都是些口号，什么最红最红，最高最高，又是誓死捍卫，无非是这些东西。在志愿书上，反映了一个同志当时的思想状况。这不能怪哪个同志，的确说明当时的时代特征。这也说明需要在这部分同志中间，这部分相当大量的同志中间，进行这方面的教育。那么，对老党员老同志来说，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老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他们有抵制有斗争，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老同志被这样的浪潮搞糊涂了，不清楚那个是，那个非，思想也给搞乱了，而且往往就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犯错误。胡耀邦同志给我们座谈时讲了这么个例子，他说：“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搞平反冤、假、错案，这一点中央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有错必纠，有些老同志过去受了冤屈，错误地处理了，现在陆续地一个个解决了、改正了。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老同志。对他们过去的错误处分撤销了、改正了，他们还是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或者过高的要求。比如：在一九五七年或是文革初期搞错了，就把他们下放到其他省市去了，现在结论改正了，宣布搞错了，向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但工作却不能再安排北京。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矛盾、困难、摆不平，都要回北京也不是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些同志去找胡耀邦同志，他当时是组织部长，去找他的人也不是一般小人物，总是比较要好的老同志。胡耀邦同志给我们讲的时候很生气，他们对耀邦同志说：请你给我批个条子，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可以通行无阻了。所以胡耀邦同志很生气，他说：你这个同志，你如果是个新同志、新党员，不懂得话还可以原谅，你是几十年的老同志了，怎么连共产党的基本法规也不懂。他说：处理一个人的问题都是一级组织的问题，怎么能凭他一个人批个条子就解决问题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在这些同志来说，因为多少年的波折，思想也搞乱了，这些原则也忘掉了。比如说，还有派性问题，过去比较明确，共产党员不许有派别活动，但是文革一来，群众中间分派，党内也分派，这样搞的结果，在党的会议上，无论是发展

党员或者在其他问题上，处处表现为这个山头那个山头，派性成了合法的东西。后来虽然不合法了，但暗地里还在作怪。在一些问题上，都说明对所有入党的同志有一个基本知识教育问题，对老同志也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究竟我们党有哪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党规党法，尤其在新形势下面，新时期提出许多新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的确摆在我们党内每个同志面前。我体会：中央有关部门之所以要由中央出面编写这个小册子是有上面几方面的考虑。那么要写成怎么样的本子，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开始有三种考虑，三种方案：一是想写成党员读本；二是想写一个入党讲话；三是想写一个党的基本知识。后来前两条都否定了，因为光是党员教育固然需要，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光是党员教育，在整个党的建设上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研究回答。入党讲话也不行了。“十一大”入党办法解释，有些也不适用了。所以最后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写一个党的基本知识。写这个册子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写的好不好标准是什么？既然我们这个本子面向广大基层干部，作为党课时的参考，那么又应该体现那些特点？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跟我们谈的时候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要求，他说：这本小册子写得好不好，关键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我们党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高度统一。简单地说，就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所以他告诉我们，要讲基本原理，你是基本知识读本，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融化在里头怎么行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基本原理如果离开了当前的实践生活，不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也不行。他说：你们写得成功不成功就在这一点。这对我们上党课来说也同样是这个要求，上党课也要有理论知识，但也要结合好具体情况，解决一点同志们中间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否则的话，这两方面不结合往往收不到好的效果。胡耀邦同志跟我们讲：你们在写法上要充满充分说理和分析，而不要拿概念吓唬人，要通俗易懂，但是也不要通俗易懂曲解了。通俗易懂应该是思想性很高、很深，但表达上要浅显。这个要求很高，当时我们开座谈会，就我们十来个人，有的同志就提出来：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达不到，我们都是来自各个方面，很多同志不是专门搞这方面工作的，我们谈了以后，胡耀邦同志又给我们谈了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要一下子搞得这么理想，十全十美，完美无缺也不可能。他说：你们搞，你们大胆地解放思想，搞出来大体差不多了，你们自己满意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们把这个稿子拿出去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出版。出版以后还可以征求意见，以后采取增补、增订的办法。他说：有一条，你们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们无非是两个出路，一个先看一下，觉得不行，压起来，暂时不出；另一个出路，看看还可以，大体上差不多，就同意出版。他还说：几十年来，在出版问题上，文艺创作问题上，这种教训可多了，是什么呢？就是动不动请首长看戏、看电影、强迫你批准，强迫你点头、鼓掌。他说：什么戏预演请他去，他一概不去。他说，我鼓这个掌还要慎重。现在他当宣传部长了，据我们了解他还是不大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只相信首长，不相信群众，这种风气不对，这种方法也不对。你写出来以后让群众去评，不要让首长来拍板。群众说好就好，群众说赖就赖。我们的戏剧、电影、出版物，都应该让人民去评论，让人民去裁决，归根到底，文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由人民群众裁决的，而不是少数人，不是首长，而是人民。他从这一个具体问题上，论述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对我们启发也很大。接着他说：当然，你们在编写过程中讨论

一些编写的方针方法，力求写得好一点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要怕，你们写出来以后，让大家提意见，我们党内那么多同志，各方面的人材都有，提了意见你们再修改。本来，我们也有个想法，认为我们去反正是做具体工作的，写出来后，第一关是主编把关，然后由那个部长拍板最后审定的，我们具体写的可以不要负什么责任。他这样一讲，也不大好意思去找他了，强迫他去签字了。后来据我了解，这个本子写出来定稿以后，送是送了，中宣部、中组部几个部长都送了，但是没有说是那个部长审定的。如果是错误的，当然是编写组负责任了。所以用试用本的名义发下来给党内同志使用、参考，包括广泛征求意见。在这里讲这一些，无非是提供一点背景材料，无非说明一点，这个本子是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对同志们来说具有参考价值。虽然是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但对党内同志来说，主要是供参考。这同党章还不同，跟我们现在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生活准则还不同，它具有某种约束力，是代表大会或者全会通过的，大家要遵守的。这个本子的情况更加不同了，它是党课教材的参考材料。当然这中间反映了一些中央的精神，但是总的来说是一种教育参考用书，供党内教育用的。有些同志提出来十一大党章跟这本书有矛盾怎么办，以哪一个为标准，这个就很难说了，十一大党章有一些不适用的地方。但是现在在十二大召开以前还没有正式废除，正式改过，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进行分析，进行思考。究竟那一些东西是符合我们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是符合我们当前实际情况的，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以这个为主，而不是以那个文字的本本为准。这样讲是否更妥善一些，这就是我要向同志们说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编写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大家也会碰到的，当时我们作了一些讨论，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争论，最后有些问题在本子上有反映，有些问题也没有完全反映，我介绍一下，无非也是供同志们阅读时参考。

第一个问题，关于党的性质。

党的性质一开始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必然碰到的，无法避免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对不对？我们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那么是不是还要讲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我们在讨论中间有的同志思想也是很解放的。他说我们这个本子要大胆一些，不要受过去的一些束缚，干脆我们取一个标题：党是革命和建设的工具，大家也容易接受。但是，这是不是符合马列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作了几次讨论。后来我们觉得关于党的性质，是不是还是应该从大一点的方面，大一点的角度，来考察回答。这个大一点角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政党并不是有了人类社会就有的，甚至也不是有了阶级社会就有的。因为在奴隶制、封建制的社会里，就没有政党，社会上没有政党这样一种政治组织，在封建社会里有的是一些会社，如“哥老会”、“青红帮”这些组织，可以看到有很大的落后性、狭隘性，充满着许多迷信色彩，所以说，这些组织作为政治组织，充其量只能说是政党的前身，或者

是政党的属性。那么现在的政党，我们讲的政党这个概念，这样一种组织，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间开始出现的。在这样的斗争中间，资产阶级需要有这样一种组织来领导革命。正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资产阶级第一次把阶级斗争明朗化了，他们需要在公开的基础上，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号召群众，跟封建制度作斗争，他们要揭开封建制度外面笼罩着的迷信的、宗教的色彩的外衣，所以资产阶级当他登上历史舞台在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中，第一次需要把自己阶级内的活跃分子，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积极分子，把他这个阶级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形成这个阶级的核心，而通过这个组织同时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体现出来，集中起来，这样就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当然是在以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还要有两个必需的条件，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要有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一个要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只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应运而生。所以，从政党的出现，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政党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是不是可以说有两方面职能：一方面，政党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出现的，而产生的，他是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起来以后，形成这样的核心以后，它马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封建制度作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也是这样，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跟资产阶级作斗争，跟剥削阶级作斗争。但是，政党同时还具有另外一种职能，就是政党担负着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赋予去完成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对资产阶级来说，它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封建主义，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以后，它的目的是很狭隘的，短浅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生产关系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的政党是具备这两个职能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例外，它既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同时又赋予它领导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这样看来，政党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普遍的命题，我们说还是对的，问题在那里呢？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或者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时候，政党的性质应该怎么样来体现？我们认为，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还没有完结，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有阶级斗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同一些旧的反动阶级的残余的斗争，同一些新生的剥削分子的斗争，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仍然是我们社会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既然我们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政党同样担负着领导这场阶级斗争的任务，还具有这样一种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职能。但是，既然我们社会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的，因此，从另外一方面看，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们党还远远没有完成。

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就象列宁所说的，使资产阶级不能存在和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以便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那要靠什么呢？最根本的是要靠大力发展生产力，靠经济建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来实现，这个经济建设本身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治。从大的方面来说，也是一场阶级斗争，因为它是为了最终战胜资产阶级，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从这个大的范围来说，何尝不可说也

是一场阶级斗争。所以，作为直接的阶级斗争工具这样一种职能减弱了，但是作为完成阶级的历史使命，达到最后消灭一切阶级的这样一种职能，还是存在的。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这样几点：第一点，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样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对的，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是对的，不应该随随便便去改掉；第二点，在我们国家，直接的阶级斗争工具职能已经减弱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任务，象五十字建党纲领所说的那样，把阶级斗争当作我们党的唯一任务，反映我们党的性质的标志，领导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把阶级斗争作为唯一任务，这种提法看来是片面的不切合实际的。第三点，我们在小册子里面，没有专门列一节标题，“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鉴于上面所说的两点考虑，把小标题改掉，还是政党的阶级性，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还是工人阶级。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科学体系。我们党的作风、党的传统，还是反映工人阶级的特性、组织性、纪律性这样一些优秀品质。我们党的成员，还是吸收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先进分子，而我们党的使命仍然是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担负着阶级斗争的使命，从这些方面看，丝毫没有离开阶级性，搞什么全民党，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全民党。我们党的阶级性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我们觉得是不是这种表示方法比较妥当一些，这样理解对不对，我们可以一道研究。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想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讲政党是阶级的代表，阶级发生了变化，政党也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讲法，阶级斗争发生变化，政党发生变化，这种现象，是不是存在？怎么理解？我觉得从历史上从现实生活中还是有的，别的不说，我们国家还有民主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们算代表那个政党？我们国家的民主党派，是历史上形成的，我们现在的政策也是明确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从它的阶级性来说，就有变化。原先它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是它们这个阶级、阶层的代表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既然在我们的国家里，现在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原先的那些剥削阶级分子呢？通过改造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那么这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它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党的性质也不同了，现在可以说，在我们国家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它政党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因为在我们国家里面，共产党是领导力量，这是明确的。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间都是明确的。但是回答政党的阶级性、阶级基础来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再研究，同样也有好的变坏的，例如第二国际的一些政党，如英国的工党，从它的阶级基础来说，原先它还是工人党，但是当它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它们政党的性质也随着变化，尽管它的成员成份，大多数还是工人，但是它已经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了，照列宁说的已是资产阶级化的政党，或者是工人运动中间的资产阶级政党，可见它的政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政党性质的变化，除了阶级基础以外，还有其它许多因素，其它许多条件。

第二个问题，关于党的领导。

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当前小平同志的报告里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从历史上看，党的领导是我们胜利的保证，从今天来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

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设想的，是不可能的。尤其在社会上现在还有错误思潮，这种错误思潮实际上是历来就有的，而今天更加突出了。有一种右的思潮，从右的方面否定党的领导。也有一种左的思潮，就是歪曲党的领导。小平同志报告里讲到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之所以提出改善党的领导，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正确理解，实现党的领导，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间，有右的思潮反对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在这种思潮存在的地方，党的领导在某种方面受到了歪曲。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是不是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正确的，但在处理上是过火的，打击面太宽，扩大化了。我们先不说反右派的前因后果，反右派以后，反右派中间提出的一些口号，党不能发号施令吗？就是说党可以发号施令了。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一九五七年以后，对党的领导，发号施令，往往是个禁区，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不敢碰，弄得不好，碰了一下，变成右派，反党。在我们的文艺作品、小说、电影中，党委书记总是正面人物，不会有什么缺点错误的，写了党委书记缺点错误就有一点反党的嫌疑。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现在，文化革命中间“四人帮”时更加有发展，两个口号连在一起，一个口号是党必须领导一切，党的领导是绝对的；第二个口号叫做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两个口号连在一起，党的领导是绝对的，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于是产生一种现象，有那么一部分同志，长期安于当外行，在一定领导岗位上发号施令，助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瞎指挥，这样一些歪风。如果说这些同志还是好同志，这是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的确有极少数坏人，当他们窃居党的一定的领导岗位以后，就利用党的领导，执政党的地位，胡作非为，做坏事。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我总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起初准备写一节，后来没有写，有一些原因，等一下讲。看来按照现在的精神还是写比较好，可是没有写进去。为什么呢？本来我们写一节，就是党必须领导一切，觉得林彪、“四人帮”破坏党、否定党、踢开党委闹革命，所以要强调一下党的领导，怎样正确体现党的领导。但是，我们把大纲送给“二胡”以后，这两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一条提了意见，而且讲了一些意见，胡耀邦同志说，党必须领导一切，后来发展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可吓人啦，结果使许多人把党领导一切变成了我领导一切，反对我，就是反党，所以说，这个里面讲了这么一个意见，不要把领导看成，是领导就有权，专门整人、管人。所以他说，要看真理在谁手里，并不是领导越高，真理就越多，要看真理在谁手里，如果真理在马夫、伙夫、挑大粪的手里，只要他说得对，也应该去学习。他说，文化革命以前，很少听到我们党内讲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文化革命一来，到处夺权，权非常突出，在人们思想上，甚至小孩子都在讲，我的爸爸管你的爸爸，这不是很荒唐吗？对于这个问题，胡乔木同志讲的比较全面，他讲，对党必须领导一切，你们要很好的表述，要加以限制，一方面，党必须领导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是党能不能正确领导，这不是一个问题，党必须领导一切，并不能保证党不犯错误，保证党能够正确领导一切，这个没有必要的联系，不是个统一的问题，所以能不能正确领导一切，这不是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声明所能够办到的，而要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他说，要防止有人利用党必须领导一切，来干坏事，小

则在一个范围里面，搞瞎指挥。这个瞎指挥不仅生产上有，各项工作都可能瞎指挥，只要违背客观规律就是瞎指挥，不符合实际情况。大则呢？有些坏人凭这一点来篡党夺权，利用党的威信，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搞阴谋活动，他这里指的就是“四人帮”了。他说，党还可能犯错误，并不是说党在什么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所以不能说领导一切就能够保证党正确。他说，要使党正确领导，还必须具备某项条件，例如说要谦虚谨慎，要有民主，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还要精通马列等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说，你们的大纲上面讲了批判“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对的，但是也不完全。他说，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它，到他一旦掌握一部分党权以后，他恰恰不是踢开而是要领导一切了。这句话是很深刻的，上海不就是这种情况吗？乱外地不乱上海，为什么上海马、徐、王可以控制各级组织来贯彻他们的极左路线和他们那一套政策呢？他说，江青就是这样说，反对我就是反党，她就是党的化身。这种观念被坏人利用就成了坏人搞阴谋活动的借口，这两位同志的讲话，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也没有什么当然的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是领导都应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不是自封的，而且要随着实践不断地发展，在实践中间不断受到检验。作为一个党，能不能充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群众的领导者，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那就是，它必须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头，能够带领群众前进，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够担当起这个领导。如果它阻碍历史的前进，不代表群众利益，就没有资格当领导。资产阶级政党不是没有当过领导，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当过领导，但是后来随着它取得了政权，这个阶级就日趋反动，资产阶级政党也就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所以，谁能够领导，谁不能够领导，最后的选择是人民群众，不是哪一个政党自己能够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那一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是一百多年来历史实践所证明的。在中国其它政党不是没有领导过，孙中山啊，洪秀全啊，义和团啊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都搞过，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政党、组织不可能给中国人民找到解放的道路，而只有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找到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我们党的领导，是通过我们党的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出来的，同时也是通过依靠我们广大党员的模范作用，吸引群众、团结群众体现出来的，根据这样一些来理解党的领导，我们可以注意研究。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也就是说党通过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来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去实现党的战斗目标和战斗任务。从这一点上说，党的领导不是行政领导，更不是具体的业务领导，那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或党包揽一切的现象，看起来好象党的权力很大，党领导一切了，实际上它并没有正确体现党的领导，在很多场合，很多情况下，恰恰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它不可能有比较集中的精力去考虑大的方针、政策、路线的贯彻，不可能从大的方面来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来实现正确领导，却陷入具体的行政事务堆中，这不但减弱了党的领导，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样一些歪风邪气。这是一点。第二点，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不是书记说了算，绝不能把党的领导歪曲成个人领导，党领导一切变成个人领导

一切。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间也是长期形成的，在党内关系、党政关系上，都是第一把手、党委书记说了算，这是不是正确？这是值得研究的，值得正确地调整的。甚至发展到什么地步呢？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可以下命令毁掉一亩庄稼，拔丢庄稼，种别的。这是多少年来发展起来的，越来越严重。我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稍微好一些，尤其偏僻的农村，越是落后的方，那书记不得了，大队书记、公社书记是土皇帝，有人反映比保甲长还厉害，这里说的并不过分，因为保甲长那时候是小生产，种田、口粮还是有的。现在把口粮、工分都扣掉。我们在座谈的时候，有人反映了这样一首歌谣，是生产队里的社员概括出来的，说现在是：“得罪了会计笔杆戳，得罪了保管压秤砣，得罪了队长干重活，得罪了书记设法活”。这种现象怎么能体现党的领导，完全是糟蹋党的领导，歪曲党的领导。名义上他是大队书记，他的所作所为是败坏了党的领导，因为他不能正确执行党的领导。第三点，党的领导，只能通过说服教育，不能靠强制，这里有一个界限，我们说行政命令，具有强制的，你必须执行，公检法更不用说了，党的领导就不能这样。在党内说来，我们党的纪律，党的民主集中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带有一定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广大党员自觉的基础上，如果说对党内还有约束力的话，党的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外来说，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我也不是党员，怎么来领导我，一定要我接受呢？那靠什么呢？党员对广大群众、对全国人民归根到底要靠说服教育，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可以接受的东西，变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党的领导一方面靠说服教育，另一方面靠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是依靠我们党员在日常生活中间、群众中间，起模范作用，团结群众，信任群众，一起前进。事实上，我们在长期的战争中间以及解放以后，就是靠这些使广大群众相信我们党的领导，而不是靠强迫命令，来让群众接受我们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的最基本的知识，这些东西，这些年来都被破坏了。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有些同志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党的威信下降了，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党的威信比起五十年代和战争年代是下降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事实。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无非是两条：一条是我们党犯了错误，犯了错误威信总要降低，你犯了错误这也不奇怪。另外一点，也是主要一点，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故意别有用心地败坏党的声誉，搞乱了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传统、作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党是犯了错误，但是也应该看到，世界上唯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勇于揭露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党的错误是自己犯的，但是也是自己揭露和检查的。唯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其他任何政党任何阶级的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从这一点上来看，党还是光明磊落的。另外我们今天之所以看到好象党的威信下降了，这跟当前社会环境有关系，有些同志说，我看“四人帮”时威信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问题那么多。群众讲的也多了，耳边听到的也多了，这要分析。“四人帮”时看起来有点统一，不至于象现在有些群众公开讲。事实上，那时候所谓的统一只是一种虚假的现象，无非是被两条卡住了，一条是存在现代迷信，把人的思想（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都束缚在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中，总归是上面讲的，领袖讲的，是真理，不允许你去怀疑，也不敢怀疑。另外一条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你要有些怀疑，有不同意见，或者提出一些意见，对不起，就给你扣上一个帽子，就给你弄个现行反革命等

等，这样一来人家也不敢去说。在这种又是迷信，又是高压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一些虚假的、表面统一的现象。那么，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党有极大的勇气在揭露“四人帮”的同时，公开地检查纠正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平反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处理了那么多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处理过程中，检查过程中、揭露过程中，就暴露了一系列工作中的阴暗面，我们自然就会看到多了、听到多了。彭德怀同志怎么样，张志新怎么样，这样一来就使有些同志觉得党也不怎么样，那么多的错误。就是有些群众对党的威信认为是下降了，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但是，这不是我们党的本质，这是我们在制定过程中、前进过程中、在纠正缺点和错误中产生的一种现象，方向是在前进，不象“四人帮”时在倒退。我们是在恢复，是在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听到一些东西，完全可以有信心的说，我们在继续前进，我们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四个现代化搞起来了，人民生活在逐步提高着，那么人民群众自然会相信我们，相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方针是正确的，党的威信自然也就会提高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能够正确分析这种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党内同志，更应该有信心，转折关头跟党同心同德，一起战胜困难，更快地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在前进路上跑得更快一些。

第三个问题，关于党的纲领。

党的纲领，就是党的奋斗目标，照恩格斯的说法，纲领是一面公开的旗帜。之所以要有纲领，要有这样一面旗帜，无非是要把队伍结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统一意志，统一步伐，一道去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是我党的最高纲领，但是共产主义又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够实现的，它必须经历不同的阶段。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各自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时候，还必须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确定党当前的、现阶段的纲领和任务，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党还要有一个最低纲领，关于党要有最高和最低纲领，这样一个区别，这样一个表述，最早是列宁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提出来的。他较明确的提出，党要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这问题上，毛主席的确很杰出地运用了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来。在民主革命时，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两步不能并作一步走，但是这两步也不能相隔一个万里长征，这样既区别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的胜利单纯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时又区别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搞一次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我们党正是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有了非常明确同时也是正确的纲领、路线，才领导了我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直到取得全国的政权。现在的问题是，当取得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党还有没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还要不要分？如果说社会主义阶段还需要有一个基本纲领，以区别于共产主义这样的最终目的的话，基本纲领的内容应是什么？应该怎样来表达较正确，怎样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个问题上，三十年来，或者讲二十多年来，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我们认为，二十多年来在纲领问题上，我们党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至少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也就是抹煞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区别？第二条就是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党的纲领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是错误

的。简单地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这两条错误，都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而且把它推到了极端，以至于造成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这个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其它的不说，就纲领这个问题上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两个方面。

第一条，如果说在民主革命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左的或右的纲领问题上的错误思潮，或错误路线的话，那么在夺取政权以后，这种错误也是很容易犯的。尤其是左的错误，这种错误不但是我们中国犯了，而且当时列宁就犯过这个错误，布尔什维克党就犯过这个错误，所以想在这里简单地提供一些历史资料。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月革命以后），曾经规定了一系列实现共产主义的措施，除了要把生产资料、流动资料收归国有以外，党纲里还规定了：要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以代替私人贸易，取消商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产品分配来代替商品流通、商品生产，不要搞商品生产，认为商品生产这一套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除此之外，在分配问题上，党纲规定要把全体人民组织到一种叫生产消费合作社里面去，而且还规定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准备消灭货币（就是钞票不要了）。首先以存款折用支票，用短期的领物证来代替货币，规定有钱一定要存到银行里，就是不让货币起商品流通的媒介作用。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所谓余粮征集制，名义上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有多余的国家征集去，不付钱的征集制，实际在当时实行的时候把很大一部分农民的口粮也征集去了。这在俄国的历史上，称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当时俄国实行这个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客观上来说是不得已的。因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旦建立起来，马上就遭到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国内又有白军、富农的叛乱，本来在世界大战中造成的经济破坏又加上三年的国内战争，所以破坏得更不成样子，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居民一天只能分配到百分之一磅的面包，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又加上那么多的叛乱、战争、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处于危在旦夕的情况下，的确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得已的。但是从主观上说，主观认识上说，这是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就是想过早的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去搞共产主义，一步登天，马上就想实现共产主义，所以采取了一系列实行共产主义的措施、政策，从而使生产和经济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当战争一结束，这个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很快使苏维埃政权跟工人、农民处在相对立的地位，发生了对抗状态，为什么呢？过去苏维埃政权代表工人、农民打退帝国主义、资本家，但是当战争一结束，工人也不满了，农民更加不满。因此罢工也发生了，有些地方，武装叛乱也出现了，国内就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高瞻远瞩地以非常大的勇敢，来纠正这些政策，实现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薪金制。薪金制政策的内容，无非就是余粮征集制，改成粮食税，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缴公粮，农民除了缴公粮以外，其他粮食可以自由支配，而且开放自由市场，可以到集市上去卖，而且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对于这一点，列宁非常坦率地讲过，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后来看了看列宁的原著，他的确是讲的很清楚，就是犯了一个错误，是一个失败，不象以后有的历史书上，包括联共党史上讲的，原来是对的，现在也是对的，反正都是对的，这是缺乏科学态度的。当时列宁对待这个问题是非常慎重

的，非常果断的，而且也是很坦率的。譬如当时列宁是这样讲的，列宁说，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他接着讲，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他讲的非常明确，他不但在国内这样讲，而且在共产国际开会的时候，面对着各国来的代表，他也这样讲，他提醒各国来的代表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这个经验教训，对于各个共产党人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希望象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样的错误以及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是谆谆告诫各国共产党都要记住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可是，我们党掌握政权以后，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也重犯了错误，第一次就是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当时就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家可能回忆得起来，搞了那么多“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要马上实现共产主义了嘛，搞一平二调，有些地方也打算取消商品政策，取消货币，有些地方设有无人商店，要什么去拿什么，结果吃了苦头，使经济受到破坏，人民生活也遇到困难。不但如此，在党内还助长了一些不正之风，浮夸风，瞎指挥等等。如果说，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界限，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错误不但是重犯了，而且是更加搞乱了，乱在什么地方呢？不但把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混淆起来了，而且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也分不清楚了。很多社会主义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相反，很多不知是什么东西，却被当作共产主义去信仰，在理论上也搞糊涂了。一九五八年时，要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了，叫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来了一个理论，就是社会主义跟旧社会差不多，跟资本主义差不多，所以在理论上也搞糊涂了。还把很多社会主义的原则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象按劳分配啊，物质刺激啊，以至于发奖金啊，统统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又搞了那么多所谓共产主义的东西，象大寨式的评工记分，穷过渡，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具体表现。说来这个错误的确也不光是我们国家有，柬埔寨搞的也是那么一套，刚刚革命胜利就取消货币，钞票不要了，把所有的城里人赶到乡下去，缩小三大差别，结果搞得象现在这个样子，当然现在这个样子还有外来的因素，越南的侵略，但是在这点上搞左的政策，想在一个早上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指导思想必然要出问题，因为它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种错误，从好人来说，是认识上的问题，在认识上就有一个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混淆了，抹煞了的问题，想不到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我们一些同志中，就有这样一个愿望，共产主义既然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现在又是执政党了，手里有权，何必不用我们手里的权，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快点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愿望，从主观动机来看也许是好的，但是正因为不符合客观规律，所以欲速则不达，越是想快，结果反而走了弯路，遭到了很大的曲折，受了损失。从坏人来说，象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来说，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他们利用了这个混淆，来贩卖他们的假共产主义、假社会主义，来糟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声誉。回顾一下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这个教训的确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深刻的。

第二条，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的途径是什么？是靠阶级斗争呢？还是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到我们“八大”的党章，还是比较正确的，“八大”一九五六年召开的时候，已经正确的说明了我们国家几千年剥削制度

已经基本结束，今后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时也提出四个现代化，不过不象现在的四个现代化，当时没有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讲了一个交通运输现代化，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思想已经有了。但是“八大”通过的这个总纲，后来我们自己没有很好地执行，以至于后来又强调阶级斗争，而且越来越强调，越来越多地搞政治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政治大动乱，指导思想上始终一贯地还是用阶级斗争这条红线来串，越搞越激烈。这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就是把消灭剥削阶级和消灭阶级这两个东西混淆了。消灭剥削阶级，我们说主要的途径，主要的手段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因为任何一个剥削阶级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不会自觉自愿地交出政权，自觉自愿地交出生产资料，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由于无产阶级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从消灭剥削阶级这一点上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但是当剥削阶级消灭以后，我们无产阶级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我们还要进一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要最后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差别，通过什么途径呢？过去长期有个理论，就是消灭阶级也要通过阶级斗争，就象同一个理论，消灭国家也要通过加强国家机器来完成一样。这个理论现在看来，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讲到阶级、国家起源的时候，都是跟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不是孤零零的从上层建筑这个领域来说明的。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早就阐明的原理，阶级的产生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阶级的消灭也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这是早就讲明了的。只有当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过富裕生活的情况下，阶级、阶级差别才有可能最终消失。因此，消灭阶级必须建筑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原来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不发达，那么阶级消灭这个过程就更加长了，任务就更加艰巨了。但是那时在我们的主观思想上是恰恰不同的，认为我们是革命中心，我们是最快的，我们要消灭阶级，只要强调阶级斗争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就颠倒了，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原理本身实际上也并不是很新鲜的，列宁早就讲过了，列宁讲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随着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剥夺剥削者这两大任务，一个是生产资料改造，一个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两大任务，基本上解决以后，无产阶级面临着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的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时列宁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讲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今天的转变，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完全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不是主观意志，我们理应在二十年前就转变了，那就好了。当然今天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能够转变，从理论上说，有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那么究竟党的基本纲领应该怎么提？“十一大”党章里有一个基本纲领的提法，我们翻出来一看，不太好用。因为“十一大”的基本纲领，基本上是继承了“九大”、“十大”的，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到底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么一句话，显然不好用。新的党章也没有出来，怎么办呢？我们最后用了一个通融的办法，在本子里同志们可以看到三十六页我们只好笼统地讲了一下，三十六页第五行开始，“在这个时期，党的纲领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插曲，原来我们写的时候，最后一句还不是这样表述的，最后一句本来写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后来有的同志提

出，又经过反复琢磨，觉得那个提法也不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逐步，那么现在就应该开始，问题是现在根本不能开始，确实是早了。现在呢？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搞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情，将来条件成熟再说，你过早地在党纲上规定的话，容易产生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们后来改了，有些提法我们是这样处理的，用这样的方法来弥补“十一大”党章中的有些不足。当然“十二大”党章出来后，以“十二大”党章为准。又比如党员的权力和义务也是这样处理的，在“十一大”党章里没有规定党员的权力和义务，就是几个要做到，这点没有规定，就和“九大”、“十大”一样，我们处理的方法也是概括的，党员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哪几条，这并不具有党章的效果，只是供我们使用的时候有个依据遵循，将来还是以新的党章为准。对纲领的问题，胡乔木同志跟我们讲了很好的意见，他说，共产主义，一方面是崇高理想，是理想，所以不能作为一个现行制度去做，不能作为一个现行政策、现行制度去执行，是我们的崇高理想，远大目标，最终目的，不能作为现行制度去做；但是另一方面，他说，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发扬，尤其是共产党员，要努力去实行，共产党员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去对待劳动，对待工作，处理同志关系，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等等，所以说，只有这样，第一将来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第二才能教育群众，使群众从党员身上相信共产主义是好的，不是坏的。共产主义怎么捉摸呢？捉摸不住了。群众往往从党员身上来看共产主义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他讲，我们说林彪、“四人帮”他们搞的是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说他们理论上歪曲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原理，而且说他们是在行动上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化，他们穷奢极欲，不择手段地损公肥私，从行动上彻底背叛了共产主义。胡乔木同志说，群众看党员，往往看你有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有没有共产主义精神。譬如说，就看你党员身上，有没有大公无私，有没有自我牺牲，能不能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等等。那个时候，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还没有提到特殊化了，那个时候，中央发了文件，是通过陕西新瑜县的干部随便打人、捆人。胡乔木同志跟我们讲的时候说，象陕西省新瑜县、志丹县的干部，任意打人、捆人，能够使群众相信共产主义吗？他说，那样的作风只能使群众害怕共产主义。他说，某些地方群众说，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受不了，搞共产主义更加没有活路了。他说，共产党员在行动上违背共产主义精神，在作风上违背共产主义准则，就会败坏共产主义声誉，事实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胡乔木同志说，这并不是说要我们党员可以不要拿工资，不要讲任何个人利益，因为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还只能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处理，这个矛盾为了分清一点，在小册子上也特别提了一下，划了一下界限。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员应当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情况下，领取合理的报酬、奖金是允许的。在农村的党员，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同时，种好自留地，搞好家庭副业，或者有时候到集市贸易上去卖一点农副产品，党的政策是允许的，也允许共产党员这样做，这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里面也包括共产党员，可以先富起来。只要你的收入不是非法收入，不是投机倒把或者是贪污盗窃来的。你既然是劳动得好，多劳多得有什么不可以呢？也应该是允许的。社会主义允许有差别，不能随随便便把这一点当资本主义来批判。

第四个问题，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从民主和集中这一对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看，是对党内说的，解决党内矛盾，解决党内关系，或者解决人民内部关系，这是区别于民主和专政这一对矛盾，这个大家都清楚。讲到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说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这句话到底确切不确切？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并不完全确切，只讲了一个方面，问题是缺少一个主题，民主就是让人讲话，那么谁让人讲话呢？无非是我让人讲话，或者是某一级领导让人讲话，如果你按照这一点来解释党内民主生活，民主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让人讲话，或者是某一级领导人让人讲话，就是民主。还意味着什么呢？民主不民主取决于我，我让你讲话就有民主了，这样就把位置完全颠倒了。我们说的民主集中制是个组织原则，是个制度。因此不是你让不让我讲话的问题，而是作为一种权利。党员讲话，发表意见是党员的权利，如果党员连这一点权利也没有，那怎么能称得上共产党呢？就很难说了。胡乔木同志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跟我们说，民主是个制度，不是你让不让人讲话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当领导的问题。让不让当党员的问题。这个话后来我们领会一下，的确很深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让我讲，我要讲，你不让我讲，我也要讲，因为这是党员的权利。你这个领导如果不让人讲话，你压制批评，打击报复，那你就违背反党纪，那么党就有权不让你当领导。你再严重违反党纪的话，就有权不让你当党员，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当然，话说回来，民主本身毕竟还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党内所以要民主，无非是要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广大党员的智慧、才能，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以便集中形成正确的意见，以便实现更正确的领导，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取得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另外一个方面，民主是个手段，集中也同样是手段，在党内来说，不能没有民主，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样也不能没有集中。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统一的意志，没有统一的政治路线，要领导全国九亿多人民去实现伟大的誓言，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统一的步伐，很难实现共同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从林彪、“四人帮”来说，他们也不是单破坏一个民主，而是既破坏党的民主，也破坏党的集中。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也不是光缺少党内民主，而是既要实行党的民主，又要实行正确的集中，两个方面同时都是需要的，都是需要恢复和加强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个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原先在讨论大纲的时候，本想把它并起来，觉得民主集中制跟纪律有关系，分开写好象比较难，是不是并在一起。后来大纲送给领导同志看了以后，胡乔木同志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还是分开写好。他说这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我们说民主集中制，讲四个服从。最近邓副主席报告里面也强调了这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但是纪律不限于这四个“服从”，纪律还包括其他的，譬如说，保守党的机密，这也是党的纪律。譬如说，党内不能搞压制批评，不能打击报复，这也是党的纪律。这里提出一条，就是共产党员要模范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对于这一点，过去我们从思想上有点忽视。也可以说，从道理上，理论上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在执政党指导下，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法令，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抱什么态度，这

跟旧社会我们共产党员闹革命的时候不同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搞党的地下工作是非法的。对于国民党的法律、法令当然应该破坏，应该违反，应该不去遵守它，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党已经执政了，执政党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法令，我们自己党内的党员不模范执行那怎么行呢？这个观念如果不牢固地建立起来，就很容易败坏党的声誉。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就说在党内受党纪处分的，绝大部分并不是由于违反四个服从，绝大部分都是由于违反国家的法律、法令，或者违背共产主义道德而受党纪处分的。当前，在社会上加强法制的情况下，党内更应该把这一点作为最起码的党纪规定下来，而不应该超越群众之上，好象国法反而管不到党员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在纪律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应该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体现这个原则，在党内不允许有特殊党员。不能形成所谓特殊党员，不能形成党的纪律只管普通党员，而担负一定领导岗位的同志就不受这个纪律的约束。这里同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文化大革命多少年来，党的观念薄弱了，党的纪律观念也薄弱了，党的决议也不那么遵守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另外一种是党内有一种不正之风，有的人专门拿纪律整人。似乎党内有一部分人是专门执行纪律的，专门拿纪律整人；另一部分人只能遵守纪律，这也是林彪、“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一种破坏和混乱。我们看得很清楚，张志新同志，她犯了什么法？她光明正大，在党的会议上对林彪、江青提意见，退一步说，即使张志新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她提意见是符合组织手续的，在党的会议提意见完全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但是就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氛下面，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不但开除了党籍，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最后被迫害至死。完全把党的纪律破坏了，而且把党的纪律和国法完全混淆起来了。胡乔木同志跟我们讲的时候，讲了一个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下面的同志、普通党员，不能够也不应该随便地恶毒地攻击上级，或者领导人；反过来说，上面的同志也不能恶毒攻击、诽谤下面的同志、普通党员。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平等的。那么你把张志新同志打成反革命，打成反党分子，最后枪毙，这对张志新同志来说，不是强加给她的罪名吗？不是恶毒攻击吗？不是诽谤吗？说到底，纪律在党内应该是人人平等的，既要反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又要反对把纪律单纯当作整人的手段，歪曲了党的纪律的本来用意。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所谓刘少奇同志的“三党六论”的批判及平反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比较方便了，五中全会已经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了，恢复名誉了。我们也有个认识过程的，一九七八年刚去的时候，大纲里还是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并提的，那个时候的历史条件是这样的，加上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水平，写了第一稿，大家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写。第一稿以后，基本上把刘少奇的名字去掉了，不讲了，后来报纸上也不讲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到去年定稿的时候，好几个省的意见里，都提了这个意见。说你们这个本子对刘少奇同志的“三党六论”怎么看，要有明确的答复，要明确地讲。定稿的时候，为这个问题，我们编写组的同志也讨论了，统一了认识。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是所谓“三党六论”，从总的来说都是强加于人的，强加在少奇同志头上的，是诬蔑不实之词，是错误的，这是总的看法。但是，我们当时考虑

到，这个本子是公开发行的，中央还没有正式决议，也不便抢在中央前面。我们这个本子里给少奇同志先平反也不妥当，这是一。第二，所谓“三党六论”也并不是中央发了哪个文件，让大家来批判“三党六论”，不是定论的东西，不是历史作了结论的东西。譬如“叛徒、内奸、工贼”这是中央全会下了历史结论的，所以现在要撤销。“三党六论”是在大批判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概括权、发明权是我们上海，流毒全党、全国。在所谓大批判的过程中，本身就有很不科学的地方，有的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有的无中生有，强加于人；有的完全是歪曲了原意，加以篡改，加以发挥，结果弄了这么个“三党六论”。所以是不科学的，今天郑重其事地在这个小册子里平反也没有必要。举个例子：“入党做官”，这句话有没有呢？有的，是少奇同志原话，什么时候讲的呢？是在一九五一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原话是这样的，很简单，他说：“过去考取秀才可以做官，现在入党可以做官，共产党员就是干部的后备名单。”就是这句话，抽出“入党做官”四个字，就变成“黑六论”之一。这句话到底对不对？我不是说今天刘少奇同志平反了，我们说他对或不对，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应该说这句话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错。为什么呢？当时全国刚刚解放，需要大量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在座的好多同志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参加工作，参加党的。从哪里选择干部呢？当然应该从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共产党员中选择，这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少奇同志这里讲的“官”，后面一句话已经解释了，就是干部。干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民的勤务员，这跟旧社会的官完全是两码事。少奇同志的这句话在当时情况下看来完全没有错，怎么能孤零零地抽出四个字来大批特批呢？那当然是诬蔑不实之词。那么，今后是不是有必要公开宣传“入党做官论”是对的，我们觉得这个也不大妥当。因为形势又发展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确有那么些人削尖脑袋钻进党内要官要权，这都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查和分析，我们在本子上也没有一个一个地加以改正、平反，有些我们认为有把握的也写了些，譬如说：“党内和平论”，党内和平，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讲过。他到底针对什么说的呢？是针对王明搞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没有斗争的地方硬要搜索一个斗争对象，人为地制造党内斗争。针对这一点，少奇同志讲，党内要有一个和平，没有斗争的时候有一个和平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硬要搞一个斗争出来，硬要搜索斗争对象呢？他就说了那么一大段话，后来概括出来“党内和平论”。在十月份的时候，还是看了少奇同志的一些著作，我们也解放思想，在党的团结这一章里，引了一大段刘少奇同志的话，这个同志们可能注意到了，没有提他的名字，在当时来说，我们认为胆子还是比较大的，现在也不稀奇了。对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有这样看法：一条就是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中央已经有定论了，他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有很多重要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等，在党的建设上，他的确给我们党作了很多贡献。所以，他的这些著作应该是，也的确是我们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全党同志很好地研究学习。另外一条，我们对待少奇同志的著作，也应该象对待毛主席著作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一样，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应该用本本主义的态度，不应该用两个“凡是”的态度，不能认为他讲的所有的话都是对的，他当时也有一定的历史条

件，而且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缺点和错误。这样看，我们是不可以辩证一点、完善一点。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这篇材料是根据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周尚文同志的
讲话记录整理（一九八〇年三月）